

与白求恩并肩战斗的珍妮·尤恩

□ 李 彦



在位于河北唐县的白求恩墓旁，紧隔着一堵低矮的石墙，立着另外一座坟墓，墓碑上镌刻着几个字：加拿大友人琼·尤恩之墓（1911—1987）。当年，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派遣，随白求恩同船来华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加拿大女护士。这位白人姑娘有个美丽的中文名字：于青莲。中国国内通常把她翻译为琼·尤恩。其实还是音译为“珍妮”更准确。

珍妮的父亲汤姆·麦克尤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世纪30年代初，一场轰动加拿大的“煽动罪”大案，导致了8位共产党人被捕。入狱者除了加共总书记蒂姆·贝克，还有这位已是报纸总编的麦克尤恩。也许是在白色恐怖下为了自保，珍妮改变了自己的姓氏，从此变成了珍妮·尤恩。珍妮在饥寒交迫的岁月里长大，从小便养成了敢作敢当的秉性。20岁出头，护校刚一毕业，她便应征前往中国，在鲁西北贫瘠的乡村里服务，几年间开辟了一个又一个医疗点。完成任务返回加拿大仅仅数月之后，命运之神便将珍妮引领到了重返华夏大地的旅程。

1937年秋天，珍妮收到加共组织部部长的电话，派遣她加入医疗队，辅助白求恩工作，原因是她能说一口流利的山东话。在纽约面试时，她第一次见到了正在为医疗队募捐讲演的白求恩。1938年1月，她与白求恩同船，从温哥华港启程。2月初，轮船抵达香港时，珍妮联络上了史沫特莱，三人搭乘运输机，飞抵武汉。

一到武汉，他们便赶上了日军飞机的轰炸。白求恩和珍妮每天都投入到平民医院救治伤员的紧张工作中，此外，还四处奔波，购买了整整15箱医药。在汉口的八

路军办事处，两人受到了周恩来和博古的欢迎。珍妮得意地回忆说：“周恩来和邓颖超正在悄悄议论什么时，我突然开口，用中文打断了他们，令这对夫妇吃了一惊。”周恩来十分诚恳地告诫白求恩和珍妮：“延安的生活异常艰苦，八路军什么也给了你们。你们可要做好吃苦耐劳的心理准备啊！”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光，白求恩和珍妮在一位八路军干部陪同下，乘火车北上，途经郑州、潼关、临汾、河津、西安，亲历了炮火纷飞、追兵压境，目睹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3月底，白求恩与珍妮历尽艰辛，终于到达延安。安顿下来的当晚，接近午夜时分，两人已在简陋的窑洞招待所里各自睡下了，警卫员却突然叫醒了珍妮，说毛泽东要接见他们。

中国艺术家绘制了毛泽东与这两位加拿大人在窑洞里秉烛夜谈的画面。他们谈了多久？谈了哪些内容？珍妮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素描：“一个男人面朝门口，站在桌旁，一只手按在书的边沿上。他穿着和延安的八路军战士们一样的蓝色棉军装，头上却戴着一顶缀有红星的八角帽。投在墙壁上的影子突显出他高大的身材……他微笑着朝我们走过来，口中说着‘欢迎欢迎’，伸出他修长柔软的大手，紧紧握住了白求恩。他的秘书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我卸下了翻译的重担……白求恩伸出双手，把自己的加拿大共产党党证呈递到毛主席面前……毛主席郑重其事地接过来看了，然后对他说，我们将把你的关系转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主席好奇地问我，你是在哪里学了这么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的？……我们四人的谈话越来越热乎。黑夜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转瞬就消逝了。”

在延安的一个月里，白求恩和珍妮忙得不亦乐乎，一面协助边区医院改进工作，一面给抗大的青年学子作世界形势报告。这期间，白求恩勤奋笔耕，撰写了大量散文通讯，用热情洋溢、挥洒自如的笔触，向西方世界介绍了汇集在延河畔宝塔山下的这支中国革命的生力军。

与此同时，在豫东教会医院工作的加拿大医生布朗也赶到了延安，令白求恩喜出望外。布朗医生谦逊低调，性情随和，那时已来华工作多年了，能说一口流利的河南腔中文。白求恩对他赞不绝口，两人十分投缘。珍妮描述了中宣部邀请他们三

人看电影的经历。那是一部在露天场地放映的苏联电影《夏伯阳》。电影放映完后，毛主席简短地讲了话，介绍了三位从加拿大远道来华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此时有个小战士建议，让加拿大的医生给大家唱一首歌。白求恩唱了一首流行小调《乔·希尔》，那首歌纪念了一位领导罢工运动而被判死刑的美国左翼运动领袖。当布朗把歌词译成中文后，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这是一个延河上闪烁着流萤、空气中洋溢着欢乐的迷人春夜。夜深后，白求恩、布朗、马海德三人一同来到珍妮的窑洞，建议她尽快动身去西安。原来，医疗队从加拿大温哥华出发时，随轮船携带了大批医疗设备，抵达香港时，暂存在那里，眼下已经运到西安了。珍妮的任务，是去迎接这批医疗设备，并顺便在西安城里尽量多采购一些药品，一并带回延安。然后，他们三个加拿大人将同时从延安出发，前往五台山前线。珍妮第二天一早就动身了，乘坐一辆卡车，前往西安。可是，途中遇到了暴雨，耽搁了两日。几天之后，珍妮乘卡车北上，匆匆追赶白求恩一行。可惜在抵达贺龙部队时，白求恩和布朗早已离开那里，去了五台山。错一步，错一生。此后，珍妮再也没有追上那远去的身影。延安的分别，竟成了她与白求恩的永别。

从那时起，珍妮又在中国停留了整整一年。她曾在雁北贺龙120师的医院里，协助救治平型关战役后遗留下来的大批伤兵，并经历了日军屠城的惊恐；她曾在绥德，把几十个汉字识得还不如她多的“红小鬼”，调教成手脚麻利、以一当十的战地医护人员；她曾在湖北跟随王炳南夫妇一起躲避日军轰炸，在沉入长江的船只上丢失了所有行囊，包括她珍贵的胶卷与日记，死里逃生；她曾在湖南跋涉于洞庭沼泽、历经长沙大火，险些丧命；她曾在周恩来的关怀下，随几名外籍男性穿越滇缅森林，辗转香港避难；她也曾在抵达上海、即将回国之际，因史沫特莱的鼓励，转而奔赴皖南，为新四军运送医药，培训卫生人员长达数月之久。

1939年5月，珍妮突然告病，匆匆离开皖南新四军驻地，乘船回国了。后来，珍妮在家乡收到了白求恩与世长辞的噩耗。

1987年，在珍妮离开人世后，她的女儿按照她的遗嘱，把她的骨灰送往中国。正如她在遗嘱中所说的：“我的心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公元前316年，秦国大举南下，占据巴蜀，从地缘格局上确立了对楚国的战略优势。张仪巧舌如簧，楚怀王放弃齐楚结盟，然而商於600里土地却是“空头支票”，秦楚矛盾迅速激化，两强走向全面对抗。危机并存，危可转机，但机也能致危，秦国在外交、军事上连进连胜，惊险的失误却在悄悄酝酿。

公元前312年，楚军北上攻打韩国雍氏城，韩求救于秦，战术摩擦迅速升级为战役对决。秦军魏章所部急速南下，直插楚国旧都丹阳，攻其必救之处，楚军进退失据，8万精锐主力全军覆没。“天时所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国殇》记录了丹阳大战的惨败，楚国痛失先手棋。

丹阳大战引发连锁反应，中原也陷入混战局面。秦军得势，樗里疾兵团大举东进，会同魏、韩进攻齐、宋联军，进一步扩大战果。一战肃秦，很快解除了齐、宋之围，齐军向北败退；二战濮水，齐将声子被俘，匡章败走，齐军收缩到濮水以北，没有招架之力。秦军东进构建于一个设想之上：楚国新败，无法在短时间内组织大规模反击。兵者诡道也，岂可以常理度之。丹阳之战彻底激怒了楚国，而樗里疾带领的秦国精锐之师，虽连战连捷，但渐行渐远，深入中原腹地，与本土难以呼应。这一切都在楚国的视线之中，巨大的胜利孕育着巨大的风险，秦国即将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楚经丹阳大败，西部屈臣兵团瓦解，景翠兵团又被牵制在韩国，似无反击之力。但宣威盛世之后，楚国幅员辽阔、国力鼎盛，从江汉之地到淮水之邦，拥有强大的战略动员能力。显然，在秦楚的首次正式对决中，双方都曾低估对方。楚国失误，有丹阳之失；秦国失误，也必酿苦果。

当秦国正沉浸在丹阳、煮枣、濮水等连续胜利的喜悦之中，楚国已经敏锐地捕捉到稍纵即逝的宝贵战机——秦国意志松懈、国内空虚！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楚国进行大规模动员，集结举国之兵，各孤注一掷之力，在丹阳之战的起点，沿武关道北上向秦国猛攻。这种绝地反击完全出乎秦国意料之外，楚军锐不可当，一路势如破竹，连克武关、商邑，即将从武关道北口破茧而出，秦国腹地渭河平原近在咫尺。一方挟带复仇怒火，一方抱定死守之念，这注定是两大强国的殊死之搏。

百密一疏，或起生死之变。楚军泰山压顶，实为秦之巨大危局。然献、孝、惠文三代励精图治、变法革新，秦已有上下贯通之制，聚指成拳之力，此役既是大难，也是大考。

一是树根本以求保国。秦国进行全国深度动员，秦王祷告上天，作《诅楚文》，痛诉楚国“欲伐我社稷，伐灭我百姓”，一方面期盼获得庇佑、坚定必胜之念，另一方面突显此役重要、最大程度调动民众积极性。血勇之气混同20级军爵激励，将帅公族但求首战而出，关中子弟但求与国同存。

二是择地利以求不败。秦国本土部队迅速集结于蓝田，等待楚军一出武关道，就进行决战。此处北依渭水，与咸阳隔水而望，南靠终南山，东有骊山，是形胜之地。如果楚据此地，不但将商洛之地完全收入囊中，而且可以随时监控关中平原，对秦国来说就是睡榻之侧有猛虎在卧。身后是巍巍咸阳、故土故乡，秦国不惜一切代价求战于蓝田，乘楚之大军不易展开，拒楚于渭水南岸。

秦楚蓝田之战的碰撞

□ 崔 庆

三是求外援以为奇变。以正守，以奇胜。楚军风头正健，秦国深知不可硬拼蛮干，迅速联系韩、魏，劝两国趁楚国空虚，南下图利。远水难解近渴，考虑到路途遥远，秦军东进之师、樗里疾的精锐兵团并没有迅速回防，反而一直在魏齐边境转战。秦国实施了一个脑洞大开的策略：在南线，由韩、魏就近出兵，攻击楚国；在东线，由秦国带领联军继续扩大战果，由韩、魏分享。这种交叉式打法必舍己方厚利，以空间换时间。从实际结果看，韩、魏实现了秦国的战略意图，而且十分投入，攻楚一直打到邓地。秦国的“小伙伴”如此给力，楚之盟友齐国却自身难保，更遑论为楚国补位。高手过招，屏息凝神，胜负多在毫厘之间。后方不稳，军心难定，远在蓝田的楚军主力不得不“忍痛割肉”，回撤本土。

蓝田系列之战是秦楚的首次碰撞，双方都有误判、损耗巨大，但这并不是结局，而只是刚刚开始。秦国有所失，亦有所得，在关键时刻识变应变，扭转了惊险的失误，同时看清了楚国实力、楚王之智，由此在筹划布局中更加谨慎稳健。



文字是文明的代表。在早期文明中，出现和使用的文字一般较少，意义也难以贯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殷商甲骨文作为中国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内容与政治密切相关。随着文字和书写系统的不断完善，文字的适用场景也不断增加，推进了早期文明的发展和国家形态的演进。

文字、政令与商代方国联盟

商代的国家形态属于方国联盟，以商王为首的商部族是联盟中的首脑和主宰者，即共主。在方国联盟中，商族通过多种方式建立与诸方国的联系，有婚姻等和平方式，也有征伐等武力方式，即使是婚姻也多是基于军事实力展开的。从政治格局看，商王朝可分为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区和外服的方国统治区，方国承担着为商王进贡、服役、戍守边疆和跟随商王作战的义务。商王的政令通行于商王畿，而到了方国，政令的传达是由方国统治者来完成，他们虽然归属于商联盟，但时有叛反的可能，所以商王十分注意方国的动向，这在甲骨文中有着相当的记载。

甲骨文只是商代文字的一部分，或者说是较少的一部分，其使用者主要是商王和大贵族，并不能完全体现商代的国家统治。从现有的资料看，商代主流的书写载体应当是简册，甲骨文中册字写作“册”，象绳绳编联竹简而成册，《尚书》记载周人强调“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即商人的书册典籍明确记载了“殷革夏命”的事情。

商王及贵族传递信息的文本应该是以竹简为主，只不过由于时间久远、保存环境等因素，竹简早已腐烂。目前已经发现的甲骨文主要为契刻，还有少量朱书墨书的，也有先毛笔书写后契刻而成的。甲骨文中已有“笔”字，象手握毛笔书写。最近公布的安阳大司空商墓H37出土的牛骨上，每行文字旁都有竖线（如图），方便契刻，明显是受到了简册的影响，这样的甲骨已有不少，说明简册才是当时通用的书写材料。根据甲骨学家朱凤瀚先生的研

文字、书写与国家形态的演进

□ 代 生

册命、礼制与西周封国联盟

西周王朝的国家形态属于封国联盟，经过统治者尤其是武王、周公的精密谋划，才形成了庞大的政治体系和格局。封国之君由姬姓、姜姓、克商中的功臣以及圣王后裔等组成，都通过周王的册封，并由“司徒授疆土，司徒授民”。

文书方面，周王的统治力主要体现在册命制度上。《左传》记载分封卫、晋、鲁国的册命文件就是《康诰》《唐诰》和《伯禽》，这就是王诫勉、封赏大臣、诸侯的一种文体形式，此外还有分给鲁国的“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前者是掌握文字、祭祀的人，后者是大量的典籍文本。分封之后，新的国君即位，也都需要周王的重新任命或册封，这既是周王权威的体现，也是诸侯国君政治合法化的表现。周王还在封国设置监官，目前所见就有应监、句监、鄂监等多件青铜器，证明了监国制度的存在，这都是强化王权的体现；《礼记·王制》记载：“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这说明周王还通过“命卿”来加强对地方的管控。《周礼》记载：“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士山盘就有相关记载，士山的职务类似大司寇，铭文记载周共王命士山去处理诸侯事务，福利新君，体现出周王对诸侯政治的直接干涉。周王对大臣、诸侯的任命，甚至大臣、诸侯对属下的任命，命书都由史官交付本人，并



安阳大司空商墓H37出土的牛骨

究，商代已经建立文书、消息传报的“传达”制度，只不过还没有形成节级传递，而是由专人送达。《甲骨文合集》23674条记载商王政令由发出到达达前后隔了48天，这说明商王的统治区域之广和统治力之强。

除了下传，还有上达，遇有重要事务如敌人侵扰，方国需要向商王告警，还承担向使者提供食宿等义务，确保了商代政令和信息传播的畅通，这些都应是通过文书传递来实现的。不过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只能大致了解商王朝政令及消息的传递过程。

有副本保存。作为一种权力和荣誉的象征，受职者往往铸造铭文以表功，青铜器中诸多的册命铭文就是这一体现。

西周时期礼法并用，统治者通过颁布礼、政令来维护统治，那时候没有成文法，但礼制的规定应有明文，礼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以周公制礼作乐为基础形成的礼制，大都被诸侯所认可并得到执行。不尊周礼的行为则被载之简册，藏之内府，使“乱臣贼子惧”。

相较而言，西周文字的书写较商代范围更广，不仅局限于周王统治区和地方封国，还到达更加遥远的周边区域。周王朝的文书系统不断完善，文字书写在西周国家管理、政治运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书行政与中央集权的形成

春秋时代王权衰微，诸侯登上历史舞台。这一时代开始的礼崩乐坏、文化下移，是文书行政由“上层”逐渐转向基层的重要因素。商、西周时期，统治者牢牢控制着文化系统，文字难以普及至“寻常百姓”，而随着世袭制的打破，私学的兴起，教育不断普及，培养了大批行政官吏，也催生了百家争鸣。在政治方面，诸侯割据，各自为战，但为了自身发展都极力加强统治，纷纷进行改革。如秦国起用商鞅变法，实行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统一度量 and 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发展策略。《商君书》强调说：“强国知十三数：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

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对这些数字的掌握都需要统计，这也是公文的主要内容。秦人还制定各项律法并广泛推行，通过置县进一步打破了原来的宗法血缘关系，使得秦王政令直接推行至基层。不惟秦国，魏、楚等国也进行了改革，秦律就吸收了魏律的许多内容；包山楚简中有大量的司法文书，涉及户籍和诉讼等制度，反映了楚国制度文明的高度发展。

秦始皇依靠先代留下的政治遗产，南征北讨而建立秦王朝，“百代皆行秦政制”，秦人建立的以文书行政作为显著特征的官僚体系，从皇帝而至郡县、乡里，实现了王朝的有效管理。近几十年来发现的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北京大学藏秦简等资料，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法律规定，体现了战国晚期至秦代，秦人对统治区域进行的文书行政。严密的文书体系确保了从中央到基层的政令传达和法律实施。这些，构成了中央集权国家行政的运作形态。

不难看出，商周王令传达先至诸侯，其后的程序则需要诸侯来完成，未能实现真正的文书行政，这是由早期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西周时期，王权逐渐开始集中，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念，周人的册命与礼制，成为后世文书行政的重要基础。随着血缘管理逐步瓦解，以郡县为代表的地缘管理体系建立，战国时代勃兴的文书行政使得统治者的权力不断加强，政令才能自上而下通畅传达。文书行政既是中央集权加强的重要手段，也是进入帝国时代的重要表现。正如卜宪群、杨振红先生指出的：“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初就形成完善的官僚行政体制和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在当时的世界实属罕见。在世界其他地方，由职业官僚构成的官僚体制的建立要晚得多。因此，一般认为，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与中国国家政治形态的早熟有着密切关系。”